

东西方文学视野下的

帕慕克研究

陈玉洪◎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
“帕慕克与东西方文学传统的比较研究”项目资助（11YJC752002）

本书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奥尔罕·帕慕克的现实主义小说研究”项目资助（16LZUJBWZY033）

东西方文学视野下的 帕慕克研究

陈玉洪◎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西方文学视野下的帕慕克研究 / 陈玉洪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311-05108-2

I. ①东… II. ①陈… III. ①帕慕克, F. O. — 文学研究 IV. ①I374.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1769号

策划编辑 施援平 王曦莹
责任编辑 王曦莹 施援平
封面设计 王曦莹

书 名 东西方文学视野下的帕慕克研究
作 者 陈玉洪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甘肃春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89千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5108-2
定 价 21.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序

2006年，土耳其小说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名噪一时。国人弘扬追捧成功者的传统，以一以贯之的炽烈热情谈论帕慕克。然而，“帕慕克热”转瞬即逝。帕慕克的语境、思维方式与叙事手法对于多数中国读者是完全陌生的，这也许是“帕慕克热”迅速降温的原因之一。

抛开少数真正爱好文学又肯认真钻研的读者以外，帕慕克的作品完全无法归入中国古今文学的诸种套路，亦与读者相对熟悉的苏俄文学、欧美文学大相径庭。

关于帕慕克，目前中外学界已有许多角度不同、观点纷呈的著述发表。陈玉洪副教授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之上考察帕慕克其人其作，既总结审视和评析别人的成果，亦抒发诠释和论证表达自己的观点，确有一得之见。

《东西方文学视野下的帕慕克研究》中涉及元小说策略、互文性、复调、杂糅等多种观念可大致归入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作者结合帕慕克的作品，或探寻作品如何彰显理论，或论证理论如何予以作品深意，在理论表述方面并无谬悖之处。对于意识流等技巧及各种小说类型，他也十分熟悉，皆有精彩的论

述。文学研究本应以文本作为基础，不宜由概念到概念、用一组概念解释另一组概念。文学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勉强阐释行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更是在各种南辕北辙的定义中不断“延异”、变身的反传统、反体系、反阐释妖孽，因此脱离具体文本的研究必定流于空泛。

本书作者基本依照文学的内部研究的思路，将帕慕克的作品作为文学现象考察。他的路径大体是通过比较与对照的策略解读文本所包裹着的理念，是阐释学式的操作。譬如他认为《我的名字叫红》不仅如帕慕克本人所说，是一部描写细密画家的艺术和生活的书，也是一部讽喻作品，隐射土耳其近代在东西方之间徘徊的历史，其根据是16世纪各派细密画家之间的斗争。而借助作品考察论证帕慕克的苏菲主义观念，甚至将这一宗教—哲学观念剥离文本讨论的路径无疑是外部研究的路径。虽然文学的外部研究自有其价值，本书以文学本体研究为主，兼及文化（如涉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历史的想象）是值得称道的。

艾略特曾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提倡作家的学者化，认为诗人应当多读书，力求学富五车、知识广博。帕慕克重视知识的积累，不仅向先贤学习，亦留意体验生活。文学之外，他深谙东西方艺术、历史，政治、哲学、宗教之精髓，应当是艾略特心仪的学者化作家。与艾柯等以学术研究做积淀的作家不同，帕慕克的知识结构完全是一位小说家的。他博采众长，将前辈作家的手法加以吸

收、改造，彰显有N种写法的小说的实验性。学者化的作家帕慕克与学者兼作家的艾柯对文学创作的贡献值得中国文学理论界研究，也值得中国作家借鉴。

本书作者注意到帕慕克从古往今来的文学中汲取营养，博采众长，杂糅各家，以无套路作为自己的套路，终成当代土耳其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大家。此处讨论的帕慕克式杂糅不是本义上的、作为一种语病的句法结构混杂 (blend)，而是五花八门的“不可方物”（《国语》）的混合 (hybrid) 式杂糅，即在作品中糅合各种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样式（侦探小说、家族小说、流浪汉小说、成长小说等）、表现手法（故事中的故事、意识流、复调和元小说策略等），等等。杂糅是帕慕克创作的精髓，也是他的作品令中国读者迷惑不解的因素之一。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土耳其与欧洲、古代与现代背景中白描式陈述与隐喻式幻象纷呈，辅之以万花筒般芜杂的众多人物（包括已逝者）、撒旦、动物（狗、马）、植物（树木）、物件（钱币）的第一人称叙事，或互证或互诬的说辞令读者无所适从，随即被迫像侦探那样在其中苦苦寻觅、求证“真相”。然而作为客体的文本在此书中不再承载传统的意义，“意义”只是“主体间性”显现的结果，确定的“真相”也就无处可觅。读者借助文本获得某种认知，随即又在文本中失去这种认知，获得另一种认知。沉浸于文本之中的读者难以逾越语言，因此退而求其次，

“学会在语言之说中栖居”。

帕慕克的创作是文学作品最终须由读者参与方可完成的佐证，可以巩固读者反应、接受美学一类批评流派的阵脚。以诠释文本的方式坐拥一个精彩的世界，这是美好、独到却又难得的审美经验。

帕慕克式杂糅不仅是以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集东西方文化于一体的土耳其共和国的专利，如果后现代主义者的隐喻地球村的确存在，它无疑是这个地球村的亮丽地标。帕慕克认为“杂糅是新生活的模式”，他对侦探小说体裁、题材与形式的借用即可视为一种别出心裁的杂糅，其成果见于《我的名字叫红》《黑书》等别具一格的玄学侦探小说。

《我的名字叫红》中以姨父大人为代表的崇尚法兰克艺术风格的西化派与以橄榄为代表的秉承土耳其传统的本土派对绘画艺术的分歧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两起谋杀案。经过业余侦探黑、奥斯曼大师和谢库瑞的不懈努力，终于揭露凶手，找回被窃的手抄画本中最后一幅意义隽永的细密画。帕慕克采用爱伦·坡在《金甲虫》首创的解译密码破案的程式，让黑与奥斯曼大师在细密画上被割开豁口的马鼻子上看出端倪。嫌犯采用“人们将称我为凶手”“人们都叫我橄榄”的不同叙事角度，使橄榄等三位画师中“谁是杀人凶手”（whodunit）这个侦探小说中的基本悬念得以巧妙地保持到最后。可以想见，帕慕克在他的原著中或许有意无意地使冠以“人们

将称我为凶手”的章节与冠以“人们都叫我橄榄”的章节叙事风格一致或接近，邀请读者参与侦破活动。在各种译本中，此类细腻的区别自然不易窥见。

这部小说用大段篇幅谈论绘画艺术，崇尚传统的叙事者们似乎沉溺于昔日帝国的余晖中不能自拔。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众多细密画大师不惜花费毕生精力使之臻于完美的高雅艺术与人类的一切活动一样，不可避免地被迫与肮脏的倾轧、卑鄙的阴谋，甚至无耻的谋杀为伍。苏丹的宝库象征权力和知识，业余侦探们在这里终于找到疑犯留下的痕迹。获得进入宝库的特权实际上是要求最大程度地获得知识并加以诠释的权力，诠释真相的来龙去脉就是行使权力。故事结局耐人寻味：嫌犯得到身首异处的惨烈报应，被他涂抹过的画却终告毁灭。

帕慕克的另一部作品《黑书》亦以寻觅为主要情节，叙述卡利普寻找失踪妻子如梦的过程，通过事件的演变揭示卡利普自我意识的觉醒。卡利普通过解读与妻子一起失踪的、她的同父异母兄长耶拉的专栏文章，探寻两人的行踪。借卡利普之口，帕慕克表达自己对玄学侦探小说的独到见解：“唯一值得阅读的侦探小说，应该是一部其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凶手是谁的小说”；况且，“书写本身只是在指涉一场梦”。这种信马由缰、梦呓式的写作正是拉康描述的“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的思辨模式。

两部作品均采用先将知识“碎片化”（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 继而重新建构的侦探小说套路。《我的名字叫红》中的艺术活动终究可归结为政治行为, 似乎在昭示纷争是人类永恒的痼疾。《黑书》中两位失踪者的下落只是虚应故事, 卡利普寻找的其实是自我, 重新发现自我才是主旨。

重新发现自我不仅是帕慕克作品中人物的使命, 也是读者在自我反身的 (self-reflexive) 冥想中可望企及的理想境界。帕慕克据此认为小说艺术“会邀请人们思考自己的生活, 而且它能实现这一点就是通过小心翼翼地构造有关个人的人格特性、感知和抉择的文学叙述”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玉洪君年富力强, 在教学之余读写不辍, 学而思, 思而学, 屡有收获。借用学者型作家帕慕克在《黑书》等作品中关于“做自己”抑或“做他人”, 遭遇他者以发现、成就自我的思索, 我认为学者之路正是向先贤学习, 继而向他们挑战的历程, 也是“为做自己先做他人”的不懈探索历程。幸甚, 玉洪君在成功地“做自己”的道路上已迈出坚实的一步。

大凡序言, 总不免流于挂一漏万, 希望读者诸君仅将以上文字视为我匆匆读过《东西方文学视野下的帕慕克研究》后的一种有感而发式的解读。

袁洪庚

2016年11月20日于兰州大学

前言

波斯13世纪重要的哲学家、诗人、伊斯兰灵性大师鲁米在其《玛斯纳维》中讲了一个神秘而有趣的寓言：土耳其画家和中国画家比赛画画。中国画家用一百种颜料画了一幅光彩夺目的画，而土耳其画家并没有画什么画，只是将墙壁打磨得光亮如鉴，使中国画家的画倒映在其中，却比原作更加光彩照人。鲁米用这个故事阐释他的苏菲哲学思想：纯洁的心灵不受色彩和线条的束缚，它拂去了世俗的不洁之物，故而能反映出安拉世界的无限性。人类的灵魂就像一面镜子，必须拂去世俗欲念的遮蔽，反映真主的各种特征，才能做到“无我”，通向“永存”。

土耳其小说家、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在其代表作《黑书》里重述了这个故事，用它来比喻自我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互为映照、相互填充的镜像关系，试图说明东方和西方乃是想象的产物，只有遭遇他者，自我才能成为自我；每个人都渴望成为他人，并将自己赠予他人。同理，东方渴望成为西方，西方也渴望成为东方，特别是当它们厌倦了做自己时。帕慕克一反国内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文化冲突论，将土耳其民族身份的问题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来观照，提出

了更加宽容和开放的、更加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文化杂糅论。他认为土耳其有时候是东方的，有时候是西方的，事实上是二者的结合体。在经历西化改革洗礼的土耳其民众纠结于“做自己”还是“做他人”时，帕慕克的文化杂糅论宛如一阵新鲜的空气，拂过躁动不安的土耳其社会，为国人关于自我身份的思考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

帕慕克亦在文学创作中实践他的文化杂糅论，吸收东西方文学遗产为我所用，成为一位兼具东方性和西方性的小说家。他对东方的波斯文学、苏菲主义文学、阿拉伯文学的继承，对波斯细密画的文学想象，以及对西方的家世小说、成长小说、侦探小说、复调、意识流、元小说等文类或叙事策略的模仿和开拓，反映了小说家对文学传统的尊重和对个人才华的坚持。帕慕克在小说创作中影射、引用或改编先驱作家的文本，实质上是在以文学创作的形式描绘这些文类的演进过程，使自己的作品与前辈作家挂钩，巧妙“借用”或“复述”前文本，向前辈作家还债。同时，这种写作姿态也有其政治内核。小说家创造性地从东西方冲突论中开辟了一条新的文化道路。他的小说暴露了土耳其激进的西化改革造成的种种弊病，同时也批评了民族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抱残守缺的文化态度。帕慕克揭示了文化单行道的种种恶果，并提出了一种民主、宽容、折中、谦逊和开放的文化立场——既不像官方的精英阶层那样，将传统文

化视若敝屣，将西方文化视若神明；也不像民族主义者那样，将西方文化视为洪水猛兽而群起攻之。帕慕克的文学创作表明，只有东西并举、博采众长，才能塑造更加丰富和美好的土耳其文化。他的小说将东方的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叙事风格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文学意象和文学观念，使我们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的概念。

本书尝试从比较文学的视野下梳理帕慕克与东西方混杂的创作特点，梳理他与先驱作家之间的渊源与谱系，帕慕克对先驱作家的认同与反抗、继承和改造、模仿和创新、定位和评价，帕慕克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分析他在创作思想、写作风格、主题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与前人的相似与变异，分析这种异同产生的原因，评价在前文本的影响下生成、变异的帕慕克小说的特点；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其创作思想及表现形式上的轨迹和发展趋势，揭示他如何呼应了先驱作家，又如何突破了后者。

帕慕克还用画家比赛的故事来比喻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之间的镜像关系，意在说明后来者作家只有模仿一位前辈大师，才能发挥自我想象力，成为一名强者作家。因此，笔者将帕慕克和东西方文学先驱置入“俄狄浦斯—父亲”的镜像关系之中，从创作动力学角度分析贯穿帕慕克创作生涯的“俄狄浦斯情结”和焦虑，探讨文学先驱对帕慕克的影响，分析帕慕克如何从遭到压

抑、个性消融的境地逐渐摆脱前人的影响，在自我想象中突出自我才能和前人的缺陷，走出前人的影响，成为一名独立的强者作家，使自己成为“焦虑的影响”的旷野。

本书运用作家传记方法和社会历史方法，结合作家生平和土耳其时代背景，探讨帕慕克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及表现，认为帕慕克的杂糅风格是土耳其现实状况和作家本人的政治观点的一面镜子，他借小说创作为他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发展道路。帕慕克的作品探索土耳其在东方和西方、历史和现实之间悖论性的存在，思考土耳其民族身份和文化叙事逻辑，回应处于世俗化和西化漩涡中的土耳其民族的身份焦虑。他通过东方文学叙事对土耳其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想象和重构，实现了对传统历史、宗教、文化和文学的回归，是对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性官方话语的温和挑战，以此对抗现实主义小说的实物主义、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叙事话语。他的西方叙事则是对土耳其保守文化势力的反戈一击，清楚地表明：土耳其的问题并非要不要西化，而是应该如何西化才能使国家变得更好。土耳其需要西方这面镜子，以将自己映照得更加光辉灿烂。

帕慕克是一位博大精深的作家，他的作品就像一座大厦，本书仅仅反映了这座大厦的小小一面。希望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和研究帕慕克。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录

第一章 概述 / 001

第二章 帕慕克创作的几个向度 / 021

第一节 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 / 022

第二节 西化潮流中的精神忧思 / 027

第三节 身份的追寻 / 034

第三章 帕慕克的东方叙事 / 039

第一节 书与画 / 040

第二节 帕慕克与《一千零一夜》 / 046

第三节 帕慕克与波斯文学 / 054

第四节 帕慕克与苏菲主义文学 / 066

第五节 帕慕克对土耳其文学的贡献 / 083

第四章 帕慕克与西方文学 / 101

第一节 帕慕克对西方小说题材的改写 / 105

第二节 复调和意识流 / 113

第三节 帕慕克与元小说策略 / 137

第四节 帕慕克与西方侦探小说 / 169

第五章 帕慕克对西方前驱作家的超越 / 182

第一节 杂糅 / 183

第二节 夸张和强化 / 187

第三节 推翻和再造 / 190

第六章 结语 / 197

附录 土耳其文学史概述 / 202

参考书目 / 211

后记 / 218

第一章

概述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是土耳其著名小说家，也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已经跻身世界文学巨擘之列，与卡尔维诺、安伯托·艾柯、博尔赫斯等文学巨匠并驾齐驱。2006年，帕慕克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其文化上日渐没落的祖国博得了无上的荣誉。瑞典文学学院的颁奖词给了帕慕克以高度的评价，说他“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这句颁奖词准确地概括了帕慕克的创作主题和风格：他的作品大多以他钟爱的故乡伊斯坦布尔为背景，探索现代化语境下的土耳其政治、社会、文化和民族身份等题材，一方面继承了伊斯兰文化、奥斯曼历史文化遗产和土耳其传统文学因子，另一方面以西方（后）现代叙事手法将其变形和演进，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方文化和文学杂糅风格。

帕慕克于1952年出生，此时距土耳其共和国实行西化改革已经过去了30年。改革使这个历经沧桑的民族走上了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资本主义道路，但其激进的姿态也使得诸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传统的文化、宗教、语言及其相应的生活方式遭到鄙弃，而西方工业文明、启蒙思想、高雅文学、快餐文化、好莱坞电影以及西

式教育被不分良莠地引入土耳其，如洪水般冲击着年轻的共和国社会。这一切来得过快、过猛，以至于土耳其人民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之间感到无所适从，各种政治、文化和宗教势力（包括世俗化政府、西化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矛盾尖锐、冲突不断。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反封建，可是共和国的领导人却盲目地“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奥斯曼帝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到淡忘，西方文明被生硬地移植和拙劣地模仿。文化出现了断层，强烈而持续的失根感使土耳其国民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和总结这场改革的得失。作为对社会问题最为敏感、最富有民族使命感的群体，知识分子用他们的文字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虑和思考。这样的时代即将促使帕慕克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民族的前途。

帕慕克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父穆斯塔法·谢夫盖·帕慕克（Mustafa Sevket Pamuk）是一名工程师、商人。20世纪20年代，刚刚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轨道，全国大兴土木，大力修建铁路、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为曾经受到歧视的土耳其商人们提供了发财的机会。嗅觉灵敏、勤劳苦干的穆斯塔法靠承包铁路建设快速积累了财富，一跃成为土耳其社会中的富人。穆斯塔法成为帕慕克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里第一代家长的原型，代表了靠智慧和实干而取得成功的第一代土耳其人。穆斯塔法在伊斯坦布尔的尼尚塔石富人区购买了一座豪华的石宅（杰夫代特先生亦如此），与妻子共同抚育了四位孩子。他们的长子是奥尔罕的父亲冈杜兹（Gündüz），工程师出身，但天性爱好自由，酷爱文学艺术，曾经将法国象征派大师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的诗歌翻译成土耳其语。父亲的文学才华对帕慕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他鼓励帕慕克成为一名作家，尽管作家在当时的土耳其并非受人欢迎的职业。帕慕克说，尽管父亲本人没有成为艺术家，“但他在我的脑中灌输了一种理念：当艺